

莫言

王蒙

格非

苏童

北岛

汤吉夫

蒋韵

王手

韩少功

麦家

杜光辉

谢冕

批评的支点

——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

毕光明 姜岚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生死疲劳》：
对历史的深度把握

《红豆》：
难以突破的禁区

《人面桃花》：
关于时间的小说

《香雪》：
文化落差的心灵风景

《两位富阳姑娘》：
阳光下的剥夺

《拾婴记》：
人世温度的一次测试

《大学纪事》：
权力欲与大学病

《怒目金刚》：
传统乡村文化孤魂的祭奠与礼赞

批评的支点

——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

毕光明 姜岚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 / 毕光明, 姜岚
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201-08388-9

I. ①批… II. ①毕… ②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381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 插页

字数：300 千字

定 价：25.00 元

文学批评之道

——序《批评的支点》

程光炜

毕光明教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我研究当代文学的同行。他约我为他和夫人姜岚女士合作的新著《批评的支点》作序，我实在没有这个资格。但作为老朋友总要前来助兴，所以我勉强写点不中用的东西。

作者在短文《批评的支点》中，对文学批评的意义，以及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多有精彩的意见。比如：“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理由。”又说：“做一个好的批评家比做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更难。这就好比舞者在舞台上把舞蹈跳好，比一个行路人把一段长长的路走完要难得多。确然，要是研究相当于走路，那么批评就是跳舞。研究靠的是肯花力气和时间，而跳舞除了下工夫，还要靠悟性、灵气和先天条件。”这些看法我都同意。在许多文章里，我都尝试着对什么是“文学批评”、它包含着哪些内容、它与文学史研究的异同点是什么等等问题作过一些初步讨论。我的看法，有一些是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受到的启发，有一些则是根据我多年研究当代文学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最近几年，我读到的毕光明教授和姜岚女士的当代文学文章，虽有“文学批评”的面目，但研究的色彩比较浓厚，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解》、《难以突破的禁区：〈红豆〉的爱情书写及其阐释的再考察》、《〈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人面桃花〉：关于时间的小说》、《文明落差间的心灵风景——〈哦，香雪〉重读》和《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等等。这些内涵沉稳、文本意识自觉的文章，在我看来就是以“研究”为视野的“文学批评”。因为它们不像很多当代文学批评那样，纯粹从艺术

感性出发,最后又落实到感性化的发现和结论上面,而是注意为它们找到相当结实的历史根据。例如,我发现他们对这些作品的讨论和分析,一直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进行,不是简单地把作品看成是“作家的创造”,而是同时又兼顾到这种“创造”与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想的关系。这样的“解释”,当然会比浮泛的文学批评更具洞察力和深刻的见解。

我不赞成研究当代文学的都去当所谓的学问家,因为文学批评从来都带给研究者一种新鲜的冲击力,他们对“新作家”、“新作品”的发现和阐释,往往会使我们改变自己的看法,即使再做历史研究和分析,也会受到这种批评的暗示和影响。不过,我也认为,盲目的、一般性的时评性的文学批评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在当代文学界,这样的人和文章确实不少,很多其实都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若干年后,它们被堆放在“文学史”的周边,占用着有效的研究空间,即使有些还可以拿来作一些次要的材料,但有价值的东西仍然不多。我理解的“文学批评”,是那种不跟着作家、思潮、时尚跑的,敢于对作品文本提出质疑,并与它展开更大空间和意义上的对话的文学批评文字。我非常喜欢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李健吾的《咀华·一集二集》,原因就在于,他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作家和作品的附庸,而是站在作品之外,同时又深入作品文本之中,以“设身处地”的批评方式,与那些杰出的文学文本进行耐心的对话,同时也提出大胆的批评。如李长之对鲁迅缺乏长篇小说写作能力的深入分析,就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和出色的例子。《批评的支点》一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在《关于时间的小说——格非的〈人面桃花〉》一文中,作者发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末端,秀米能回望自己的人生。站在另一个时间层面,秀米能看到很多人的生命情景。”又比如在《文明落差间的心灵风景——〈哦,香雪〉重读》中,作者分析道:“铅笔盒这个象征性的实物,是这篇小说的纽结所在,自始至终也是主人公的情结。小说所描绘的,主要就是这铅笔盒所引起的内心波澜。铅笔盒作为一个文具,自然可以看成知识的象征。对知识的追求,正是80年代初现代化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上最响亮的话语,乡村中学生香雪的铅笔盒故事,不能说没有呼应关于现代化的历史诉求,故事的讲述多多少少也就带有叙事性。但是铅笔盒故事里

的道具意义,它所不断暗示的,还是人性的魅力。”这显然是那种“历史的理解和同情”式的文学批评。它有意味的地方是,作者不光把自己当成批评家,也把自己当成和我们一样的读者,去“设身处地”地替香雪着想;但与此同时,它又无意识地带着我们和读者,站在与香雪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看她“人生的风景”,把她和描写她的小说“历史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铁凝的《哦,香雪》既是“80年代的小说”,也是“80年代的问题”,也就是作者试图要揭示的80年代的“现代化问题”:这个国家的发展方案如何被落实到这座小山村的,它是如何通过这群乡村女孩子与火车的关系被带到小说中去的。如此处理,就把小说的“重读”进一步“问题化”了,它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当时未被文学批评注意到,而现在却被文学史研究充分扩容了的那些极其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内涵。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排斥“文学研究”。相反,我倒怀疑“纯粹”的“文学批评”是否能够超越“感性”层面,给读者更多更丰富的启发。所以,我认为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职责是把读者带到文学作品之中去,帮助读者去分辨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同时带着读者走出作品,告诉他们这些作品中“发生”了什么,这些在过去和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对我们的历史和未来意味着什么。只把读者带进文学作品,而不把他们带出来的文学批评家,是我不那么欣赏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只是一些文学作品的鉴定家。当然,我所希望看到的那种“理想”的文学批评确实是有很大难度的批评性的工作,是我一直希望尝试、但至今仍感到困难重重、甚至没有办法的一份事业。《批评的支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进展,我也愿意它成为我批评的对象。文学批评,只有通过不断的对话才能产生真正的意义。

2009年4月14日于北京森林大第

目 录

辑一 小说杰作抽样解读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解/3

难以突破的禁区

——《红豆》的爱情书写及其阐释的再考察/14

对历史的深度把握

——莫言的《生死疲劳》/22

关于时间的小说

——格非的《人面桃花》/32

文明落差间的心灵风景

——《哦，香雪》重读/35

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

——以“底层叙事”为例/44

阳光下的剥夺

——《两位富阳姑娘》的深层意蕴/55

禁语：权力对人生的败坏

——《说话》解读/68

让魂灵经历

——读莫言的《生死疲劳》/77

人世温度的一次测试

——评苏童的《拾婴记》/81

传统乡村文化孤魂的祭奠与礼赞

——评韩少功的《怒目金刚》/85

权力欲与大学病

——读汤吉夫的《大学纪事》/89

难以告别的革命

——评蒋韵的短篇小说《红色娘子军》/93

当活着失去理由

——评方格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98

触摸最柔软的部位

——评王手的《软肋》/101

疗救沉疴赖“青皮”

——评杜光辉的《陈皮理气》/104

《人生》的魅力：悲剧美/108

辑二 诗与散文的艺术观照

象征诗的新突起及其发展变异

——80年代的现代诗潮/123

艺术之光照彻心灵

——北岛谢冕会谈记/159

乐感的诗与思的诗

——论新旧诗之别兼谈现代诗与诗歌传统的关系/169

拥抱美好的生命

——格致散文启示录/177

凭海而歌：“红帆”诗社二十年

——《波涛里的翅膀》（代序）/185

人生写意：诗之于李孟伦

——序《走入世纪的瞳孔》/192

洁净的心地

——王强斐诗歌印象/198

独语在多梦的雨季

——序吴永波《叩你的门》/204

客观写作的社会价值

——评罗灯光的《樵歌牧唱》/206

从大自然中找回自我

——方令儒的《琅琊山游记》评赏/209

恍然而入幽境

——赏钟敬文《太湖游记》/212

辑三 人文立场与文学批评

社会主义伦理与“十七年”文学生态/217

精神的八十年代/225

当代文学三十年/228

理解纯文学/231

文学批评：第三种标准/234

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237

批评的支点/243

经典的末路/246

小说与超女/249

学术何为/253

知识分子与爱国/255

为学术裁军叫好/258

辑四 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播

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教育

——以中学语文教育为中心/263

人文教育与立人/268
通识教育何处去/273
砍掉这棵树/276
高考试题与读书/279
读经的困惑/282
回到原典/285
学报与学术/288
学报的活法/290
学报如何办成专刊/293
学报的潜力/296
学报改制 出路何在/299

辑五 语文美育

题材与主题:纪实文学的审美导向
——以中学语文教材为中心/305
结构与节奏:纪实文学的审美时空
——以中学语文教材为中心/322
叙述与描写:纪实文学的美学表现
——以中学语文教材为中心/337
语言:纪实文学的美学风貌
——以中学语文教材为中心/355

后记/371

辑一

小说杰作抽样解读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解 *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歧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下,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有人认为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委机关里的现实生活,人物和环境描写都具有典型性;有人则认为作品把党委机关写得一团糟,严重歪曲了现实生活。又如,在分析刘世吾这一人物时,有人认为刘世吾是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官僚主义形象,有人却认为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是不存在的,是对老干部的丑

* 本文发表于《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全文转载。收入《21世纪年度文学评论选·2005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化。^①用今天的眼光看,处在 50 年代中期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评论者,无论持肯定态度的还是持否定意见的,大多不能摆脱政治功利或社会功利的实用主义文艺观。当他们以“真实”作为评价文学创作的标准时,实际上较少顾及作品本身和作品的实际,因为一种先验的社会历史观或人文信念造成了他们对文学创作审美机能的盲视。8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王蒙本人创作有很大发展,变得十分丰富,为我们返视当代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视角,重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回到文本以发现意义的一个尝试。

从题目看主题与结构

小说原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下简称《组织部》),1956 年 9 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时,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来收入 1956 年《短篇小说选》及其他集子时,作者又将其改为原题。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里也用的是原题。可见王蒙用这个题目有他的用意。

两个题目的逻辑重音不同,作者的题目放在“年轻人”上,而改题是“新来的”。这样就牵涉到小说的视角问题。前者是内部视角(尽管是第三人称,但小说的基点是在林震身上,叙述是以林震为视角的),在审美品格上标明了小说的表现性,而主要不是生活写实。后者成了外部视角,从外面来看小说,不是小说自身生成的题目。如果说作者的题目是小说的眼睛(内部精神的窗口),那么改换后的题目就有点像贴上去的标签。

更重要的是,改换后的题目与小说的“意向性”不合。在王蒙小说创作中,有一个贯穿到后来的冲突模式,即自我意识趋向与外部现实

^① 关于 50 年代中期该作品“论争”观点的整理,参见於可训、吴济时、陈美兰主编的《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第 1~12 页。

的冲突,同时也是某种人格类型与一种文化规则的冲突。在《组织部》这篇小说中,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实现愿望,同以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传统文化规范(对个体人格的选择模式)的冲突和摩擦。这种似乎是个人的理想和外部现实的冲突,贯穿了王蒙后来的很多小说,这也是王蒙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的一个解读中国社会冲突的重要的主题线索。

“年轻人”作为题目的中心词,这种自我定性在表层上有一点谦称的味道。但从真实语义看,它在王蒙小说中是一种人格类型、人格主体的代名词。以林震作为最先出场者,王蒙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系列:《布礼》中的钟亦成,《杂色》中的曹千里,《名医梁有志传奇》中的梁有志,《活动变人形》里的倪藻、倪吾诚……

在《组织部》里,“年轻人”——林震,是这个小说的原发点,这篇小说是由他的感受、体验而产生的,或者说,小说的动机与意向性,都产生于林震的内心体验。这篇小说,如果说有事件,那么它是有一个心理事件;如果说存在心理冲突,也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冲突。

小说的意向性决定了它的内在结构。小说以林震的心灵为端点,形成一个扇形结构。它有两极:一极是与韩常新、刘世吾的冲突,这是与机械力量的摩擦;另一极是人的纠葛,即与赵慧文的心灵感应,两者相遇引发的情绪波流。介于中间的是小说的表面的故事纽结,即麻袋厂事件。

小说的两极在深层上是主人公欲念——生命原力的放射。冲突与纠葛都由他的内在世界外扩而发生。与韩、刘为代表的组织力量的冲撞,反映的是主人公的“功名欲”,同赵慧文的情感纠葛触及的是“爱欲”。最后,在外部压力下,功名欲战胜爱欲;革命工作战胜了朦胧的爱情,爱情让位于党的工作。

错读、误读及其必然性

错读是指当时首先不是把它当小说来读,很少从小说艺术、审美

的角度去读小说,对小说(文本)缺乏“审美的注意”。或者说注意的不是“意味”,而是“意义”。评论者多从严肃的社会学和政治角度去挖掘它的含义、作用,考察它的社会效果,很少谈及小说的机智、谐趣、抒情性和戏剧化手法。今天看来,王蒙在那时就天才地运用了反讽手法造成小说的艺术张力。

错读的另一表现是把小说的虚构当成了新闻报道,用生活的真实性去要求小说的真实,给人物和事件坐实。而另一方面却又把对生活的实裁诬指为“影射”。

错读在当时是必然的。1942年以来,文艺已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1949年后,当代文学便被明确地规定只能以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为唯一正确的方向。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来说,小说不仅仅是小说,甚至首先不是小说。人们要求小说的,是像《不能走那条路》^①那样的作用和效果。

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讨论小说,就是用“典型理论”来分析(这应该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操作)时,用的也是一种教条化的、被歪曲了的变质的典型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文学本质的观念,即文学通过塑造反映阶级本质的典型形象,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去规范小说,得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而像唐挚等人那样反对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去代替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②

误读,是指对人物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作二值的价值判断,加以正反定性,简单地把刘世吾视为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代表甚至是典型。很少注意到作品对韩常新的批评。其实,更深一层的误读,是误

① 李准的这个短篇,发表于1953年11月的《河南日报》,反映农村分得土地后的“翻身农民”面临的“两极分化”,宣扬农业集体化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小说因及时配合了当时农村开展的改革运动并体现了既定政策且形象可感,而受到广泛重视,《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还被印发给农村工作队员作为参考与指导。

② 唐挚:《谈刘世吾性格及其他》,《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

以为小说的目的是刻画刘世吾的形象,达到反映问题、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目的,而忽视了林震的心理感受,忽视了林震对生活的诗意要求。这跟当时人们注重客观而忌讳主观是有关系的。在客观论的片面认识论的时代思潮中,人们不可能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体验小说、感受小说、心念小说。

这篇小说确实可视为问题小说,然而对“问题”的理解,当时不是从个人观察和感受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即有一个先定的前提——党是没有错误的,不可批评的。这从当时人们批评小说是一种“影射”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王蒙后来不必辩解,而应为之庆幸,如果小说揭示的是更高也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话)。5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已变得往往从概念出发(“主流论”即是表现之一,衡量作品的标准是所谓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现实还是“歪曲”了现实),而不能从作品营造的象征性艺术世界出发。甚至不能从生活出发,更不能从个人感受出发。而这篇小说恰恰是重在个人感受。小说着重写的是生活有时候带来的“某种情绪的波流”。

被组织:刘世吾的悲剧

刘世吾作为革命主体,在革命成功后,存在一个功能转换问题。刘世吾的被动性和悲剧就在这里。他对这一点不一定完全意识到了,即使意识到了,出于自我肯定的本能他也不承认。试想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旧政权的颠覆者到新政权的维护者,刘世吾能干什么?该怎么干?

刘世吾有两个口头语:“就那么回事”,“党工作者”。这两个口头语反映了刘非常现实也非常聪明的选择,当然也出于一种惯性和无意识。这两个口头语说明了刘世吾懂得孰轻孰重,懂得替谁负责,它们是革命经验赋予刘世吾的政治理性。“就那么回事”针对的是实际事务。“党工作者”,则体现了一种角色意识。是“党工作者”,而不是“党的工